

安倍外交的成果

西原 正（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

安倍首相对 47 国充满精力的出访

安倍首相在当政 19 个月中，对 47 个国家进行了访问，这也是多边外交方针的体现，也是有战略性考虑的访问，力说日本安全保障作用的扩大，展开对核电站、高铁、日本食品等的顶级销售，可谓实施了他所推行的“地球仪外交”。目前世界看日本的眼光正在发生改变。

首相在内阁成立后率先进行了 2 个月的华盛顿访问，以《日本回来了》（在华盛顿的演讲题目）来推出强大的日本，之后在达沃斯会议、NATO 理事会、香格里拉会议（新加坡）等中做了演讲，并出席波斯普鲁斯海峡海底隧道地铁开通仪式、索契冬季奥林匹克大会开幕式以及在巴西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为推进 2020 年东京奥林匹克）等，对他充满精力的身影有目共睹。期间，对东盟全 10 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并踏上了对蒙古、印度、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外访，这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此外，也对中东、欧洲、非洲、中南美等国家进行了访问，可谓实现了大国外交。

美国议会对于日本的关注也在增加，2014 年 3 月，由 62 名下院议员组成超党派“日本同盟”，在 2013 年有 26 名上下两院议员访问了日本，到 2014 年 4 月底已经增至 50 名。



西原正 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 (RIPS)

通过“法治”对中国加以牵制的安倍外交

但遗憾的是安倍首相虽然已上任 19 个月，但仍未实现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作为与日本安全保障有直接关系的区域，关切到安倍外交的真正实力，由于日中之间围绕尖阁诸岛引起的对立，以及对单方面划设“防空识别区”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安倍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等，日中关系显著恶化。到 2014 年中期只出现了一些稍微缓和的迹象。另外，在日韩间由于围绕慰安妇、竹岛、历史认识等问题存在对立，两国间的安全保障合作在退步，美国加入后终于可以实现三方首脑会谈。终于在 2014 年 8 月上旬举行的东盟外长级会议上，实现了日韩、日中的外相会谈。

因此日本摆脱目前这一状况,离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国和韩国之间的首脑会谈尚有一段距离,预计这还是将来的事情。因此安倍政权在与中韩两国关系紧张期间,努力强化与两国周围国家的关系,采取站在对中、对韩关系有利立场的这一策略还是具有成效的。

这让我们想起过去5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保障会议(正式称为“香格里拉”对话)上安倍首相所做的主题演讲。这个会议是2002年由伦敦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IISS),邀请国防部长级别高层进行的安全保障专家会议,参加者约有400名,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最有权威的会议之一。在举行会议的第一个晚餐会上会有首相级别嘉宾的主题演讲,而今年是由安倍首相完成了这一使命。在举行的第13次会议上,日本的首相初次得到邀请正说明了对日本评价的提高。

在晚餐会上安倍首相做了题为《实现亚洲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法治为日本、为亚洲、也为世界》的演讲,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中国正在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这一演讲明显是对中国进行的一种牵制。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中,首相表示“日本想为实现和平积极做出努力”的发言获得了会场上一片掌声。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中,依次进行了国防部长的演讲,其中有几位在“正如昨晚安倍首相所言”中提及了安倍首相的讲演,充分说明了通过国际法解决地域纷争。

在全体会议上小野寺防卫大臣继美国国防长官哈格尔之后第二位登场,仍然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及中国自制。但因中方派出的代表并非为国防部长,而是由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所以演讲被安排在最后一日。王中将对安倍首相和哈格尔国防长官做出了强烈的质疑,明确指出了日美和中国对立的构图。大多出席者对中国在南海海域设置钻油平台探勘等强硬外交表示批判,可以说中国陷入孤立状态。

会议中明确表明,自2013年11月中国在东海单方设置“防空识别区”(ADIZ),美国对此表示不承认以来美中关系恶化。日美两国普遍认为,中国的“防空识别区”不同于其他国家,认为这是企图“扩大领空”,是中国试图通过“防空识别区”将美国的势力逐渐驱逐出西太平洋策略的第一步。

2013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国家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并提议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图。此后,习主席在今年5月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演讲中,提出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此举是将太平洋势力范围美中平分,排除美国而推进以中国为主导的西太平洋安全保障问题的构想。这意味着让西太平洋驻日美军撤退,无可置疑这也是日美无法接受的构想。另外,中国在2013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倡议筹建排除美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构想。日美与东盟诸国、澳洲等国对此构想必须进行控制。

8月初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会议上,也有很多参加国对中国的强硬外交表示了强烈的批判,东盟诸国中虽然有柬埔寨、泰国等国表示反对对中批判,但大部分国家都纷纷表示期待日美能保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平衡,安倍外交在此问题上可以说发挥了作用。

安倍政权在7月1日重新诠释了宪法第9条,做出了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等纷纷表示赞成。尤其是东盟诸国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别,但基本上也都表示赞成。持批判意见的只有韩国和中国,这意味着一部分日本媒体做出的由于韩国和中国的反对而使日本成为亚洲孤儿的这一批判并不成立。

针对朝鲜半岛新力学的对应

在朝鲜半岛势力关系的变化中，安倍外交试图站在有利地位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成功。在北朝鲜第一书记金正恩掌握势力以来，中朝及南北朝鲜的关系有所恶化，北朝鲜仍期待与美国签订两国协议，但美国对此并未作出回应。北朝鲜为了摆脱孤立状态开始接近日本，日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对绑架问题有所解决。

另外，韩国虽然因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试图与美国联手强化对日批判，但在2014年2月访韩的凯利国务长官向韩国提出了修复日韩关系的愿望。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决定美国表示赞成，表明了与韩国相反的立场。从这一点上而言，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以牵制韩国的安倍外交获得了成功。

朴槿惠总统在就任后的出访中，频繁在首脑会谈等中对“日本右倾化”、“日本不正视历史的态度”做了批判，这出于韩国国内的一种自信，即韩国一贯站在“谴责”日本的有利地位，但在国际上通过对他国频繁批判的外交并未得到好评。无疑，安倍首相在维持国际关系安定中强调“积极的和平主义”和“法治”的重要性，并推动签订军事技术转移的协议无疑得到了评价。如果日中关系得到改善，日朝之间建立关系的话，韩国会陷入孤立，因此韩国中也出现了对朴总统和尹炳世外交部长的对日方针批评的声音。2014年8月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外长级会议中，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实现了与岸田外长的会谈，但对并无进展的北朝鲜问题流露出了焦虑。因此安倍外交在对韩外交上也开始处于有利的立场。

尤其美国对日本在绑架问题上为求得进展是否放松了制裁，同时也开始担忧这会导致制裁走向崩溃。安倍政权在不解除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前提下，必须推行让绑架被害者及其他日本人从北朝鲜安全返回日本的政策，即便如此，日朝关系若有所进展的话，日本会在对韩、对关系上也可能处在较为有利的立场。

韩国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强化与中国关系的“二岔口外交”，以维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但这不安定的外交无疑会让自己国家处于不利的立场，7月初，习近平国家主席和朴大总统在首尔举行的首脑会谈上，重申了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对合力进行政治和安全保障的实践进行了确认，两国指导者对“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了一致。这是蓄意阻止美国选择将核武器带入半岛的举措，弱化韩美同盟的一步，日本应该努力阻止这个倾向。

这也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推行的“对日共斗”模式有关，中国一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谴责日本，安倍政权上台后同时与韩国保持一致的步调。习近平国家主席接受韩国朴槿惠大总统的请求，于2014年1月在哈尔滨车站建立了安重根纪念馆，另外，习主席在7月访韩时，曾对朴大总统提议共同举行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纪念活动，朴大总统虽未立即作答，但同意中韩两国携手进行关于日本的历史研究。对日本而言，必须有效推进牵制中韩行动的外交。

日本即使对中韩提出了“历史问题应该放在核心外交问题之外进行讨论”的主张，但中韩目的显然是在对日本进行政治上的诋毁，因此日本一直以来主张“慰安妇问题已依法得到解决”，但此反驳几乎没有效果。日本一改以往的姿态，提出了对日韩不利的外交问题（比如要求中国天安

门事件的真相、追究韩国兵在越南战争中的“蛮行”真相等）来做出的反驳，这会对缓和对日批判有一定的效果。

为提高国际评价更需做出外交努力

很多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比起距离远的国家，与邻国的外交相当费脑筋，日本当然不是例外。即使与邻国外交关系在恶化，但通过坚持不懈的民间交流也有可能改善外交关系。安倍政权通过经济政策使日元贬值，外国观光客急剧增加，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从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访日国人每年由145万人增加到245万人，访日中国人每年由44万人增加到131万人。另外，2014年上半年，访日中国人达到100万余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8%。中国、韩国的观光客对日本并不抱有偏见，重新认识了国内所言传的“日本正在迈向军国主义”、“日本是极右民族分子的国家”纯属谬传，对日本保持良好的印象回国，如此持续下去的话相比会对两国对日政策产生影响。安倍首相以罕见的活力让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在提高日本存在度上无疑取得了成功。今后期待与周围国家及远方友好国家的关系强化中，以修复与邻国的关系恶化，同时维护东亚的安定。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西原 正（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

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1937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1972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称号。历任京都产业大学和防卫大学校教授，2000年就任防卫大学校长。2006年退关后，就任一般社団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著作有 *The Japanese and Sukarno's Indonesia: Tokyo-Jakarta Relations, 1951-1966*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and *Reconsidering the Japan-U.S. Alliance* (co-editor, Akishobo, 2010)等。
